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论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

李圣菊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抗战时期,由于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湖南省积极开展了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幅度增加了湖南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军民用粮,同时也增强了国统区粮食管理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坚持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2-0134-05

抗战时期,作为坚持抗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粮食的充足供应变得极为重要。军民对粮食的需求迅速增加,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特别是改良粮食品种并普遍推广变得尤为重要。湖南省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开展了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湖南在全国粮食生产中一直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夙称"湖广熟,天下足",滨湖各县,向被誉为"鱼米之乡",仅从湖南省稻米一项年产量在13000万公石以上,占全国总产量10%左右,足以见得[1]343。而且,湖南每年除供应本省军民食粮外,还出口大宗粮食接济邻省,运销南北。据1936年《长沙经济调查报告》记载,战前"湖南每年出口谷米,除因歉年政府禁止或限制出口外,每年约在两到三百万担之间。"[2]但是抗战爆发后,特别是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湖南粮食也出现供需紧张状况。

(一)抗战军民用粮的大量需求,使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变得极为紧迫

抗战时期,全国对粮食的需求急剧增加。1941-1945年4个年头全国共征收谷麦达24,490万石,每年平均在6000万石以上[3],比战前增加了很多倍。而战区大批难民向后方省区的迁移,又对中西部省份的粮食供给造成了沉重压力。昆明——安南铁路北切断之后,从国外进口粮食更加困难。因此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迫在眉睫。要在短时间内增加粮食产量,就必须尽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而最重要的就是改良粮食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湖南作为中部农业大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二)抗战爆发后,全国和湖南粮田减少,粮食产量也逐年下降,供需矛盾更加严重

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国粮田面积的减少以及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了粮食的供需矛盾更加激烈。1942年后方十三省的农作物面积较1937年减少了17.3%,产量也减少了13.3%[4]。据农产促进委员会调查,抗战时期大后方十四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量一般都在减少。以1937年单位产量为100,1940年的产量总指数为96.1,平均降低4%。其中稻减少3%,最为严重的是小米,减少12%[5]。抗战时期,粮食总产量相比战前产量减少了大约40%,其中稻谷产量减少了

收稿日期:2007-01-22

作者简介:李圣菊(1982-),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21%，小麦产量减少了61%，杂粮产量减少了大约57%[6]。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加剧了全国粮食供需矛盾，促使各省积极行动，增加产量。

（三）战前湖南粮食品种复杂，品质差、产量低，较为优良的品种也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战前，据湖南农事试验场对湖南主要产稻区 21 个县的粮食品种调查，得出结果品种复杂，多者有 10－30 余种，少的有数种，且大部分品质低劣，产量不高。“所产之米多不纯良，普通之湘米质地硬而缺少柔润。”[7]98栽培较为广泛的相对优良品种“粒谷早”，亩产也仅为四石至五石，其他稻种产额多为三、四石之间[8]。而且，战前，即使有较优良的粮食品种，农民也因为缺乏选种知识，以至于某些优良品种得不到广泛推广，粮食产量难以增加，所产之谷米也不适应社会实际之需要[7]244。因此，为了尽快提高粮食总产量，满足抗战需要，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研制、实验或引进大批新品种，同时宣传优良品种，使农业认识并接受优良品种，扩大耕种面积变得极为必要而紧迫了。

二、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的措施

为了改良粮食作物品种并在全省普遍推广，湖南省在国民政府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设立了一整套机构专门负责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还拨出大量专项资金支持农业推广，同时注意增加农民受益以提高农民推广粮食优良品种的积极性。

（一）在国民政府的指导下，建立了省—县—乡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行政、实验及推广机构负责各项事务

战前，湖南就设立了“湘米改进委员会”等专门研究主持粮食品种的改良，并先后设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农事实验场，作为品种的实验与推广基地。抗战爆发以后，为了促进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于 1938 年 7 月成立了省农业改进所，并于 1941 年 5 月将芷江农业推广委员会改组为省农业推广委员会，使之隶属于省农业改进所，同时受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的辅导，综合办理全省农业推广事务。另外，还设立了农林部湘省推广繁殖站，派技术专员组织调查队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县农业推广所组织大纲及农林部组织章程》，省农业推广所下设立了县农业推广所。截至 1944 年 5 月，全国共有县农业推广所 578 所，而湖南就有 74 所，占 12.8%[9]171。县农业推广所下即为农民自行组织、推广基层农业改进工作的乡农会。根据农会法，湖南设立了众多农会，鼓励农民加入农会，把农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指导，推动生产。这些机构协调合作，共同促进了抗战时期湖南的粮食作物品种的改良与推广。

（二）国民政府与湖南省政府拨助大量经费支持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

为了切实实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国民政府与湖南省政府都分别拨出了大批经费，支持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普遍推广工作。湖南省粮食品种与推广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省预算案内拨支，二是中央的补助费。从下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对湖南以及湖南本省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

（三）改良与推广机构积极进行粮食品种改良实验与大面积推广

1. 研制或引进优良品种

湖南省粮食品种改良的主要负责机构是“湘米改进委员会”、省农业改进所等。在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的指导下，湖南的农业改进机构与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农业试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农学院密切合作进行粮食品种的改良试验，研制出了大批优良品种。抗战时期，湖南改良与推广的稻种达 12 种之多，分别为万利籼、黄金籼、抗战籼、胜利籼、南特号、三零五选粘、浙场九号、茶粘一号、小南粘、檑子粘、一二五七等。湖南推广的优良麦种也较

多,包括中大美国玉皮、金大二九零五、中农七四一号、七零七号、金大七一六号、浙江美玉、芷江黄麦等。相比于水稻,湖南推广的优良麦种多引自其他省份或国外,如"中大美国玉皮"就是引种于美国,"金大二九零五"则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先行试验,再向湖南等适宜地区宣传推广。

2. 推广优良品种

抗战时期,后方推广的改良稻种共约130种,推广改良麦种约50余种[9]12。湖南水稻推广由省农业改进所之稻作组统筹主持。该所分派了许多高级技术人员长驻长沙、衡阳等县进行巡回督导。1938年,衡阳、岳阳、澧县等九县共推广优良麦种8600余石,推广面积达138,000余亩[1]345。1939年,省农业改进所西迁至沅陵,在沅陵、芷江等地设立工作站六处,又在长沙等地设立稻作推广督导区五处,指导农民推广优良品种。是年,以乾城、沅陵等十六县推广良种面积达110,000余亩,在芷江等县推广杂粮16,496亩[1]346。1940年,又设立溆浦农业推广实验区等,并在全省推广改良稻种面积630,000余亩[1]348,占全国推广面积的52%以上。1941年,原有的26个工作站发展到了30个。这一年,增设立了衡山农业推广所,以及南岳、白果、吴集等中心推广区,在全省24个县推广优良稻种面积达882,540市亩[1]350,推广工作进展极为迅速。

3. 训练农业推广人才,办理农事调查与研究,促进粮食品种的进一步改良与推广

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1年3月创办了农事通讯工作,分配通讯员1320人到各个省份进行农事调查,并把粮食增产问题的调查作为农事通讯的首次调查,其中,湖南就有23个县参与了调查并上交报告,这对于解决湖南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极大帮助[10]。借鉴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湖南省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机构为了不断改进粮食品种并在全省大面积推广,也扩大了对工作成果的宣传与调查力度,训练了大批农业推广人才,分派各地办理农事调查与研究,同时,加强了农业推广示范,并编辑出版相关刊物,有效地促进了粮食品种的进一步改良与推广。

(四)中央及湖南省各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贷款,发展农村合作事业,增加农民收益,提高农民推广改良稻种的积极性

为了促进粮食优良品种的试验推广,中央及湖南省各金融机构提供大量农业贷款,发展农民组织,增加农民收益,极大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兴办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农业合作社,仅米麦杂粮合作社就占了高达18.94%的比重[9]96:中国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还为农业改进机关与农业学校提供长期低利贷款,发放土地债券,建立合作金库,增设农贷通讯处等,这为开展粮食品种与推广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仅1944年1—3月提供的农业推广贷款额为6,3884万元[9]114。中农行还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农林技术机关收购储备大量优良作物种子,以供扩大推广之用。1944年,中农行与农林部合作办理收购优良稻种资金4000万元,约可收购2万市担,推广40万亩,以每亩增收50斤估计,约增产20万市担;收购麦种资金2000万元,约收购5千市担,推广6万亩,以每亩增收30斤估计,约增产18,000市担[9]118。不仅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益也大大增加了。1938年-1941年农民收益增加了20,700余万元[9]137,截至1944年6月止,增加农民总收益达45,300余万元[11]。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优良品种的推广。

三、粮食作物改良品种与推广的成效

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省的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大幅度地提高了湖南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也改善了粮食的营养价值

抗战时期,湖南经过改良的量食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湖南粮食优良品种的大面积推广使得全省粮食总产量突飞猛进。1938年,湖南推广水稻良种13万余亩,增产65,000

余市担;1939 年推广 20 万亩,增产 100,000 市担;1940 年又推广 65 万余亩[9]33。下面仅以湖南 1941 年推广水稻良种成效为例分析湖南在后方粮食生产中的特殊地位。

	湖南	后方 13 省总计	湖南所占比例
推广面积(市亩)	882,540	1,817,446	48.56%
增产量(市担)	527,524	1,054,400	50% 以上
各增产项目总推广面积(市亩)	3,647,745	32,430,089	11.25%
各增产项目总增产量(市担)	4,781,056	73,811,162	6.5%

(材料来源于秦孝仪. 革命文献,第一 0 三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年,第 304、305、308、309 页。)

上表中,就湖南全省而言,推广良种增产占总增产量的 11%,而后方各省推广良种增产仅占总增产量的 1.4%,湖南推广优良稻种增产量大大高于后方各省的平均增产量。由此,明显可以看出湖南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的突出成效。

抗战期间,湖南粮食作物品种改良不仅极大的提高了粮食的产量,也促进了粮食营养价值的改进,对于增强人民的体能,提高军民战斗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抗战结束时,长江区域粮食储运委员会为收复地区提供粮食数量的数字记载,湖南的粮食收购价格最高,包括装运杂费每市石达 6000 元,远远高于其他省份的 4500 元或者更低[12]77-78。差价如此悬殊,除了地区等差异外,粮食品种与等级差价算是最重要之因素。

(二)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大幅度增产也提高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为抗战提供了充足的军民食粮,对于增强国统区战时粮食管理的宏观调控能力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湖南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促使了湖南乃至全国的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抗战提供了充裕的军粮民食。1942 年各省征购军粮总数为 30,656,274 市石,其中,湖南被征购的粮食达 5,600,000 市石,仅次于四川,排名第二[12]2-3。抗战初期,湖南谷米每年出口达 2,000,000 市担以上,最高达 3,500,000 市担,之后由于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的积极开展,1939 年湖南在供给本省所需粮食以外,共剩余粮食达 10,000,000 市担以上[13]。另据 1940 年统计,湖南收获稻谷 162,257,480 市石,连同杂粮产量共为 167,225,014 市石,除去本省全年消耗 159,819,414 市石外,约剩余粮食 7,405,600 市石[9]133,足见湖南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

湖南不仅为本省提供了充足粮食,而且还向周边各省,如四川、广东、广西、湖北等省输送大批粮食,接济军民食用。抗战爆发后,交通部川陕川湘水陆联运处曾一度以输运湘米入川为中心工作。据《新华日报》记载,四川用盐换取湖南粮食,一次就多达 25,000 包[14]。广东战前一直进口洋米,抗战爆发后,“转而赖湘米为唯一之供给。”[9]42 湖南、江西等省国米运粤运动也曾盛极一时。据记载,第九战区代第四战区粮管处购办熟米一次就达 35,000 大包,拨售第四战区粮管处及购粮会军谷 193,000 石;另外,还出售陈谷 300,000 石,代购新谷 700,000 万石,同时还向第九战区粮管处代购兵站军米十余万石,运往广东接济民食[9]43。1940 年,广西粮管处向湖南购买的第一批粮食就达 500,000 万担,广西银行也定购了 200,000 万担[15]。据第九战区的资料记载,抗战中的某一年中,除由第九战区粮管处奉令拨往广西之稻谷 300,000 石,糙米 30,000 大包外,广西粮管处又与第九战区粮管处订购新谷 500,000 万市石,接济军民食用[9]47。以上可见湖南对周边各省乃至全国的粮食管理的宏观调控上发挥的重大作用。而且,湖南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我国的粮食进口,减少了对外界的依赖,同时有利于增强抵御战争与灾荒的能力。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由于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湖南担负起了增加粮食产量的历史重任,开展了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提高了湖南乃至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为

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军民食粮,同时也增强了国统区战时粮食管理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少了对外界的依赖,为坚持抗战的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秦孝仪. 革命文献,第一0四辑[M]. 台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2] 傅冠群. 湖南社会大观[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45.
[3] 董长芝,李 帆. 中国现代经济史[M]. 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00.
[4]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90-191.
[5] 陈翰笙.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M].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379.
[6]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9.
[7] 李 振. 湖南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M]. (美国)中文资料中心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湖南图书馆藏,出版年不详.
[8] 张人价. 湖南粮食生产调查[M]. 湖南图书馆藏,出版年不详:221.
[9] 秦孝仪. 革命文献,第一0二辑[M]. 台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10] 秦孝仪. 革命文献,第一0三辑[M]. 台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377-378.
[11] 佚 名. 中国战时粮食问题及其政策[M]. 超星电子图书,1942:147.
[12] 秦孝仪. 革命文献,第一一一辑[M]. 台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13] 储备川湘过剩食粮救济谷贱伤农 政府已定统筹办法[N]. 新华日报,1939-11-17.
[14] 国内简讯[N]. 新华日报,1940-11-05.
[15] 桂省调整粮食供应[N]. 新华日报,1940-10-16.

Improved and Spread Grain Type in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LI Sheng-j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of grain increased greatly, people in Hunan Province developed actively the work which improved and spread grain type and got striking achievement, which increased greatly the average output and the total output of Hunan Province. All of these provided a great amount of grain for the soldiers and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meanwhile, increased the macro-control ability of grain management in the region dominated by the Kuomintang, which made vital contributions to insist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Hunan; Grain Type; Improve; Spread